

宋庆龄与福利站的“小先生”



宋庆龄曾说，“我的一生是和少年儿童联系在一起的。”“有些事情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她心里一直装着对少年儿童的关怀和祝福。在她看来，全人类可以在保卫儿童方面找到世界和平的立足点。

发起“小先生运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地战火连绵，宋庆龄牵挂着苦难深重的少年儿童，积极奔走，呼吁社会各界捐助少年儿童生活急需，更关注孩子们的文化教育。采取怎样的方式开展教育？她一直在思考着、探索着。

当时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教育界提出“教育为公”，推行“小先生制”、创办学校，培养“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产生广泛影响。

1930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大场创办上海工学团，开展普及教学运动，创立了“小先生制”，即“小孩教小孩、小孩教成人”的学习方式，使大人恢复其“赤子之心”，有助于整个民族“返老还童”，在当时遍地文盲的旧社会为扫盲普教、治愚治穷探索了一条新路。1936年，陶行知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在会上介绍“小先生制”，备受欢迎。

1946年8月，陶行知逝世。宋庆龄将“小先生”蕴含的少年儿童教育理念和实践与自己毕生致力的少年儿童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光大，发起“小先生运动”。

全面推行“小先生制”

1947年4月，宋庆龄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的上海儿童图书阅览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一儿童福利站。7月，她委任陶行知在上海郊区主办的山海乡村实验学校校长马崇儒为第一儿童福利站站长，支持他推动“小先生”活动。同年10月和11月，中国

福利基金会又陆续成立了两个儿童福利站，全面推行“小先生制”。

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主要是从附近的公立小学学生中挑选的，大多出身贫苦家庭，中国福利基金会帮他们付学费，使他们能继续上学，同时经过训练，由这些小学生担任识字班的“小先生”。也有些热心公益的中学生，从阅览室的义务服务员转为担任“小先生”，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十二三岁。识字班的学生则都是从上海街头的失学儿童中招收来的。

“小先生”的大本营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三个儿童福利站，设在圆顶的铁皮活动房里，每个铁皮房面积约100平方米，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军设计制造的，后来作为剩余物资，经过宋庆龄争取，由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工业善后处分配给中国福利基金会。

在这里学习的学生们走出教室就是扫盲识字班的“小先生”，其中有童工、拾荒者、卖报的、擦皮鞋的、孤儿、难童。不知何时，因为要去当学徒或工人，他们的学习就会中断。为此，教师们有针对性地编写了识字课本《老少通》，既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学习，也可以给成人扫盲用。

宋庆龄曾说，通过扫盲班两年学习，“我们能教会他们3‘r’s，加上卫生知识和一些历史地理常识，我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所谓3‘r’s，指reading（读）、writing（写）、arithmetic（算）的缩写。识字班的学生走出福利站的教室，成为老师。他们在自己家、弄堂口、理发摊旁，在任何空闲地点，把学到的知识教给不如他们的人。他们骄傲地在墙上、树上插起“识字班”的三角小旗，挂上小黑板，随处都是课堂，三五个学生就可以开课。这样，三个儿童福利站的300名“小先生”可以直接给2000多名上不起学的儿童甚至成人实施扫盲。

许多“小先生”来自贫穷家庭，能体会穷人的甘苦。参加“识字班”的人情况不同，有的早晨要先上工，有的家里有晚起的老人或病人，有的要操持家务……许多家庭没电灯，上课时间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只能插空安排。定好上课时间后，准时开课也很难，因为绝大部分家庭都没时钟。“小先生”往往要跑到附近有时钟的地方，看了时间后跑回来给学生上课。

“小先生制”的发展

1948年，宋庆龄在致友人的信中自豪地说，我们“已培养了300多名‘小先生’”，“受惠儿童已达15000人”。她还说，我们认为以“小先生”或“小辅导员”制为基础举办扫盲班、保健教育和卫生措施，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长远的影响。采用这种办法，可使儿童负起社会责任，爱护和改进他们周围的环境。

宋庆龄说：“这确实是在为中国培养未来的民主领袖，并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传播文化，符合我国最大的需要之一”；“通过小先生制，我们相信，我们正在提供一种方法可以训练许多未来的领袖——那些关注并实行改善全国同胞生活标准工作纲领的人”。“小先生制”是最实际的助人助学的方法，“给他们工具，让他们去锻造中国光明的未来。”

1949年上海迎接解放，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组织了宣传队，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奔向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

1949年12月11日，宋庆龄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发出了“所有儿童必须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并展开‘小先生’运动以扫除文盲”的号召。新中国成立后，“小先生”活动与党领导的少年儿童工作少先队结合起来。

迄今为止，“小先生制”理念和实践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教育界，“小先生制”的理念得到长期深入广泛的贯彻，各科教师积极实践“小先生”理念，以把握教育规律，提高学生积极性，促进教学效果。

2011年5月29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时代小先生”计划启动，以宋庆龄故居为基地开展的时代小先生志愿讲解活动，为少年儿童搭建服务平台、设计社会角色，使孩子们学习担当社会责任。每周六日小先生为观众志愿讲解，已经成为故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到节日或纪念日，成百上千的小先生来到这里，参加故居组织的诗词朗诵、文艺表演。每年暑期，时代小先生积极参加夏令营，学习中英双语讲解，提高综合技能。

来源：《人民政协报》

第一枚金属国徽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方案最终确定。国庆一周年纪念日，有关部门临时赶制了一枚木质国徽，而铸造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器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前身）。

接到任务后，厂子立马成立攻坚小组，28岁刚刚入党的吴嘉祐有幸加入其中。

吴嘉祐介绍，国徽质地为铜铝合金，然而两种金属熔点相差较大，因此浇铸的火候时机不易掌握。“工人们经过反复试验，采取局部浇水、加速冷却的方法，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吴嘉祐当时负责第二道工序——精加工抛光。这道工序还被细分为五：清理、修补、精雕细琢、刮平、抛光。“我们用钢丝刷将国徽毛坯凹凸不平处打磨干净，再用小刀将国徽图案雕刻出来，刮刀刮平后整体抛光，这样国徽就如镜面般光亮。”

在此期间，沈阳第一机器厂的车间内彻夜灯火通明，工人白天黑夜连轴转。没有炉子，工人们砌了个砖炉；没有化铝罐，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剂，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在炉前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

1951年4月，沈阳第一机器厂提前20天成功铸造出10多枚不同型号的国徽，其中直径2米的大型国徽于1951年5月1日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来源：《人民日报》

红军第一架飞机

1930年3月16日，国民党空军美制“柯塞”式飞机由武汉飞往开封执行通信联络任务的返航途中，因大雾迷航，被迫降落在宣化店（今湖北省大悟县），被红军俘获，特区工农民主政府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1932年6月，国民党发动第4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将“列宁”号飞机拆散埋入大别山中。直到1951年9月，飞机的部件才从山沟里被挖出来。如今在北京空军航空博物馆里，“列宁号”的复制样机静静地陈列着，成为这段历史永久的纪念。

来源：《人民日报》